

飘逝 裁员 茶 奇梦记 傅正业教授的颠倒世界 夹缝 第二次隐瞒 喻春鸟 沉默的竖琴 夜莺 麦耶诗抄四首  
《清宫怨》与《大鹏山》 论八月的影剧坛 评九月的影与剧 《北京人》与《京华尘梦》 话剧应该商业化  
各谈刘琼与张伐 岁尾影剧评 《贝壳》 新年影剧漫评 关于剧评的话 观影杂感 观剧漫评 《芙蓉》与《  
青春》 《艳阳天》、《荒岛英雄》 话剧女演员论 七夕谈剧 观剧随谈 这一月的影与剧 无灯光的十  
佳电影三部曲 在旧上海喝咖啡 中依稀忆上海 张爱玲 80年代纽约行 巴基斯坦行之一 新都 旧都 - 巴基斯坦行之二 玄奘右  
不疲 吾首不孤 从后 另一种出书难 关于回忆录 寂寞的自语者 听风楼里的辛勤耕耘者 哀老

# 董乐山文集

第一卷

DONG LE SHAN WENJI

N O T E S H A N

河 北 教 育 出 版 社 S H A N W

DongLeShan | WenJi

# 董乐山文集

第一卷

李 辉 编

河北教育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董乐山文集 (全四卷) /李辉编.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1.7

ISBN 7-5434-4274-4

I . 董… II . 李… III . ①董乐山-文集②文艺评论-文集 IV . I06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42896 号

书 名 董乐山文集(1—4 卷)

作 者 董乐山 著 李辉 编

责任编辑 张艳茹 路殿维

装帧设计 张志伟

---

出版发行 河北教育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印 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98.25

字 数 1,432 千字

版 次 2001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434-4274-4/I·605

定 价 128.00 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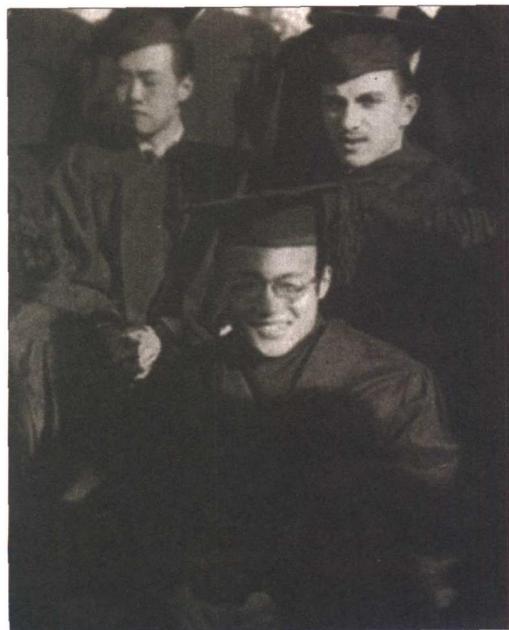
董乐山本人最喜欢的一张照片。1996年摄于北京。



1948年，董乐山（左二）与友人在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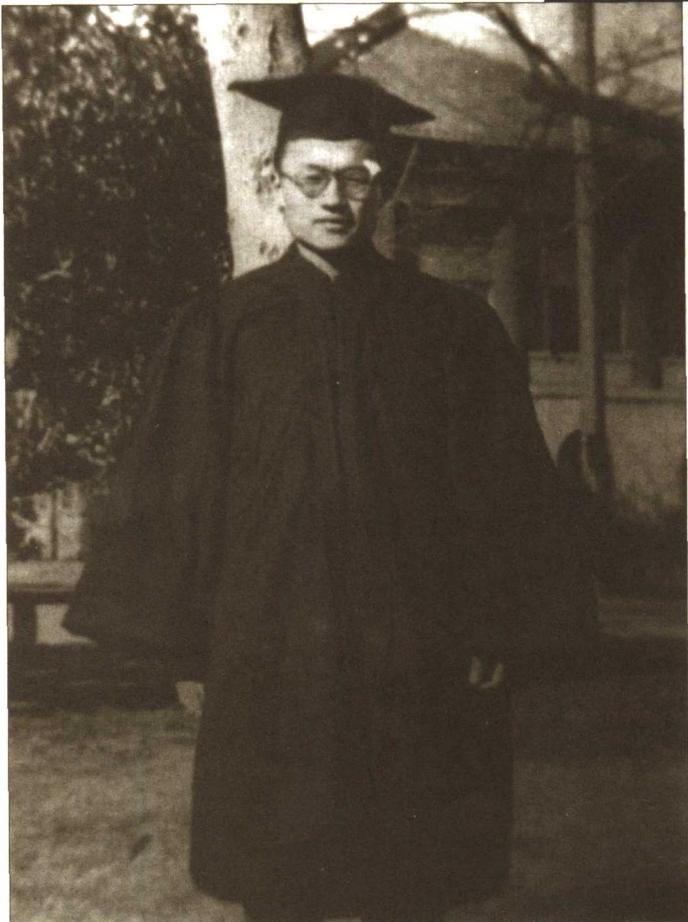
1965年冬与夫人凌晚君在北京天文馆留影。



大学毕业时刻，1946年。



少年时代在宁波，1934年。



1946年初董乐山在上海圣约翰大学的毕业照。



1944年，董乐山（右一）、董鼎山（左二）与友人在上海圣约翰校园。

## ~~红岩~~《嘉陵江上》译后记

我译本没有前言或后记的习惯，但是出版界似乎流行这样做法。现有一阵子编辑每  
一本书前面都有一篇“出版者说明”<sup>或曰交代</sup>，  
也有这样一句：“本书的印行是为读者阶级的经  
济，书中所含阶级观念，与译者译者所持  
和批判”云云。为了想解放了，这种“穿插而入”的  
“贩卖资产阶级书籍”的腔调似严嵩矣，但是  
“出版者说明”却被“译者译者”所代替。当然  
在介绍一部作品时，有一篇“译者译者”，  
对于读者来说本末无一祥。<sup>有董的</sup>但是也很  
多情况之下，这种“译者译者”不过是“出版者  
说明”的翻版，<sup>译者译者</sup>字数长一些而已，其逃  
避“罪责”用意如何——到末了还是下面的一句  
话收尾。

按我中人的脾气，是宁可不出书也不写那  
样的“说明”的。<sup>这倒</sup>并不足因为我的胆子不大，<sup>骨气有底硬，</sup>  
承担“罪责”，而是觉得这是对读者的侮辱。<sup>这倒</sup>  
有理由<sup>是</sup>是说起来我于 1933 年，结识过他的  
因为书的内容，就是最好的“说明”，读者自然能  
力分析鉴别，毋庸另外说明。可是

## 本 卷 说 明

本卷分为小说与诗、麦耶剧评、自己的世界、附录四个部分。

**小说与诗** 收录已搜集到的董乐山在不同时期创作的小说与诗歌，注明发表时间、报刊或写作时间。

**麦耶剧评** 收录已搜集到的董乐山 40 年代以“麦耶”为笔名在上海发表的剧评，其中包括书评两篇。注明发表时间或写作时间。

**自己的世界** 收录董乐山所写与个人经历有关的各类文章，包括回忆录、怀念他人的文章等。能反映个人生活状况的序、跋也选入此辑。该辑文章均写于文革结束之后，大致按照写作或发表时间顺序排列，但不一一注明时间。

**附录** 收录他人关于董乐山的文章、两次追思会的座谈会纪要等。

# 与命运抗争

——董乐山的一生

## (代序)

亦波

董乐山 1924 年 11 月 14 日生于浙江宁波，1999 年 1 月 16 日病逝于北京。他出生于五四运动后的中国，以文学青年出道，从事新闻翻译和英文教学多年，晚年转学术界研究著书，终以著名翻译家、作家和学者辞世。董乐山一生视界开阔、涉猎广泛，在高中和大学时期发表过小说、诗歌和译作，写过大量剧评和影评，编辑过文学刊物。进入翻译界工作后，他开创的译风承先启后，继往开来，他的翻译文笔隽永流畅，琅琅上口。他在翻译介绍国外重要学术和文学作品时掇英拾蕊，慧眼独具，在国内思想界和一般读者间产生过广泛的影响。他在翻译上所取得的成就证明他是继巴金等老一代翻译家之后的优秀代表人物之一。他晚年在从事学术研究、编纂辞书之余所写的杂文言简意赅、启人心智，有不少忠实的读者。董乐山是我国一位才华横溢、不可多得的翻译家、作家和学者。

1924 年 11 月 14 日，董乐山出生于宁波城里一个中等商贾之家，父亲从事染料生意。他在家里排行第三，上有两个兄长，下有弟、妹各一。六岁时，董乐山进了当地一家私塾。1930 年的私塾已经是名存实亡，教的不再是四书五经，而是民国政府的小学课本了。两年之后私塾被正式取缔，董乐山转入一教会小学，继而升入一所教会初中。他晚年曾自谦自己的旧学功底来自于小学时期阅读的武侠小说、晚清暴露文学和鸳鸯蝴蝶派言情小说。

1937年的“七·七”事变打断了董乐山的正规学业。在宁波乡间躲避日寇半年后，他转到上海租界里的一所中学继续念书。在中学时期，他开始大量接触中国近代文学作品，阅读了从创刊号起的《创造》、《新月》、《文学》、《太白》、《光明》、《中流》和后来在后方出版的《文艺阵地》等文学刊物。1938年初中三年级时，他开始尝试自己的文学创作。他曾用笔名田禾写了几首抒情短诗，投稿到《大美晚报》。出乎他自己的意料，他的第一首诗就被《大美晚报》“浅草”副刊主编柯灵看中，登在副刊发表。这时的董乐山不仅开始崭露他的文学才华，也开始关注社会上的不公正现象。除了抒情短诗外，他还写了一些较长的叙事诗。其中一首描写上海电车工人罢工和反映上海社会现象的发表在诗刊《行列》上。诗人袁水拍特地在香港《大公报》撰文加以赞扬和引述。

也就是在这个时期，董乐山开始接触到左翼思想和共产党人。在初中的最后一年和高中的三年时间里，他把大部分精力投入到抗日救国运动和阅读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苏俄文学作品上。这时的中国正处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危难之中。1940年3月，汪精卫傀儡政权在南京粉墨登场。同年夏天，上海租界里的大、中学校掀起了反对悬挂伪国旗和反对学校向汪精卫伪政权“登记”的反汪斗争。这时已在光华附中上高中的董乐山作为代表全校学生的二十一名学生代表之一，出面向校方交涉，反对学校去“登记”。这场交涉的结果，是校方终于未去“登记”，但是董乐山也因此被“勒令转学”（变相开除），而且上了“黑名单”。秋天开学时，他转考另外几所高中而不取，只好辗转于几所弄堂中学栖身。他认为这段经历是他一生中的一个转折点。没有在一个正规学校接受基础课程训练的机会，使他从此与理工科无缘，彻底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

受到诗作发表的鼓舞，董乐山又开始尝试短篇小说的创作。不料这次又是一举成功，他的第一篇小说就被《小说月报》采用。编辑部通知他小说即将在下一期刊出，不想随即发生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驻租界，《小说月报》停刊，董乐山的第一篇小说因此也与世人缘悭一面。

日伪统治上海期间，所有正面宣传抗日的报刊和杂志都被迫停刊，

写作已无出路。在文化娱乐方面，美国电影被禁止上映，能够上映的国产电影内容庸俗、水平低下，稍具文化修养的人惟一的高尚娱乐就是看话剧。话剧因此而出奇地繁荣，活跃的话剧团居然有十几个，主要有“苦干”、“上艺”、“中旅”、“中实”、“联艺”、“华艺”等等，实为中国话剧史上一特有的现象。经常演出的除了电影导演费穆主持的上海剧艺社（“上艺”）外，还有戏剧家黄佐临主持的“苦干”剧团。后者除了汇集了一些戏剧家如李健吾、姚克、柯灵和编剧师陀（芦焚）之外，还罗致了当时一批比较优秀的演员如石挥、张伐、韩非、白文等。当时先在“上艺”，后又加盟“苦干”的白文是董乐山此时的高中同学和好友，董乐山经常和白文出入后台，观看他们排戏演出，开始对话剧发生了兴趣，看了戏不免有感想，有了感想不免要形诸笔墨。就这样，董乐山开始为一些报刊撰写戏剧评论，以至到后来在从1942年到1944年近三年的时间里用麦耶、史蒂华的笔名每月定期为当时上海惟一的一个大型综合性文艺刊物《杂志》（主持人后来证明是中共秘密工作者）撰写剧评专栏。除了《杂志》之外，在一份叫《女声》的妇女杂志上也时常可以看到他的评论文章。

这些剧评显然成为研究40年代上海话剧活动不可或缺的重要史料。对40年代上海话剧活动颇有研究的陈学勇根据董乐山当时的剧评撰文指出杨绛一共写过三部而不是通常人们所认为的两部喜剧，除了人们熟识的《称心如意》和《弄真成假》之外，还应有叫做《游戏人间》的第三部。

1982年，董乐山在美国康奈尔大学作为美国卢斯基金会访问教授时，无意中发现负责接待的爱德华·耿（Edward Gunn）教授是专门研究中国抗战时期文学活动的学者。他在自己专著《不受欢迎的缪斯》中评述上海那段时期的戏剧活动时引述了很多董乐山所写的剧评。这个巧缘令双方大为惊喜。

董乐山所写的剧评眼光敏锐、笔锋犀利、分析老到，一点也看不出是出自一个年仅二十上下的年轻人笔下。他的评论就戏论戏，如实褒贬，并不在乎对方是名导演、名编剧，还是初出茅庐的新演员。比如他在看了杨绛的喜剧之后，一反当时的权威观点，认为杨绛喜剧中中的主人

公无一不是悲剧人物，并坦言“我始终认为杨绛是一位悲剧作者”。他在另一篇文章中对刚刚出道不久的卫禹平和孙道临赞赏有加。在观看了孙道临参加演出的《葛嫩娘》和《鸳鸯谱》之后，他认为孙道临是个难得的演员。

1943年，年末弱冠的董乐山在《万象》杂志第4期戏剧专辑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话剧应该商业化》的论文。该文对话剧商业化的利弊条分缕析，立论精辟，在今天看来仍然具有现实意义。而中国的话剧界乃至文艺界再次面对商业化这个问题则是四十年后的80年代。日久天长，也许不再满足于评点他人，董乐山根据英国名喜剧作家诺耳·考德（Noel Coward, 1899—1973）的名喜剧《私人生活》改编了一部喜剧《二度蜜月》。该剧1946年在上海上演，由著名导演胡导导演，乔奇和罗兰主演，共演出了二十多场。

此时董乐山的创作活动并不限于剧评，还包括书评和影评。他不但继续写小说和诗歌，还编辑文学刊物。他的创作散见于《春秋》、《幸福》、《风雨谈》、《联声》、《诗歌丛刊》、《时代·文艺》、《文汇报》、《大美晚报》等报刊。他的翻译小说也开始出现，其中一篇是美国作家斯坦倍克的中篇小说《珍珠》。

董乐山于1942年考入圣约翰大学英国文学系主修英国文学，从师不少名师，其中有曾经在清华教过曹禺、张骏祥、李健吾等人莎士比亚作品的王文显、教授欧洲戏剧的戏剧家姚克、教授英国小说和散文的司徒丹兰（后任南开大学英语系主任）和教授新闻写作的彭望荃（后任北京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1946年大学毕业后，董乐山淡出政治活动，但这并不妨碍他继续在报纸上（如《文汇报》的“世纪风”副刊）痛斥国民党政府的专制和腐败。他同时也面对生活现实的压力——写剧评并不能维持生计，他需要有一个有固定收入的职业。他决定选择记者和编辑的工作。可是上海的新闻业在抗战胜利后的繁荣只是昙花一现，很快就由于国民党在内战中的节节败退而日趋萧条。国民党政权本身也是风雨飘摇、杌陧不安。在毕业一年多之后，董乐山才在一家地方报纸谋到一个助理编辑的职位。一年之后，翻译家冯亦代的夫人郑安娜介绍董乐山去考取了美国新闻处

她自己因离职而空出来的翻译职位。当时的美国新闻处由后来成为美国著名汉学家的费正清主持，与当时进步文人和共产党人，如龚澎、乔冠华等都有联络往来。郑安娜是因为要去中国福利会给宋庆龄当秘书才离职的，她希望找个信赖的朋友去顶替自己留下的空缺。董乐山如果能预见这一共半年的工作经历会对他的将来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也许他会对自己这次更换工作另作它想。

## 二

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国民党达官贵人纷纷逃离上海。董乐山的一些进步文人朋友相继去了香港。他自己也有机会可以离开中国大陆去香港工作。但是尽管他对工作的前景有一定的忧虑，他还是决定留下来。因为他热爱自己的祖国，痛恨帝国主义的欺凌和国民党政府的专制腐败。新中国百废待兴，他希望为新中国的建设发挥自己的智慧和才干，使中国成为一个自由、民主、繁荣和富强的国家。

等待董乐山的却是失业。他报考各类职业训练班，托人介绍到新闻或外事机关找工作，但是就是找不到和他的专长有关的任何工作，他此时还没有认识到自己在政治上得不到充分信任，是不可能在一些政治上敏感的机构中找到任何工作的。而这类敏感机构对他之所以另眼看待，也是他自己的诚实造成的，因为他行事一向光明磊落，在填写自己的履历表时，从不讳言自己过去的经历。

几经周折，事情总算在1950年初有了转机。董乐山考取了南下上海招聘翻译人才的新华社外文部。做新闻翻译工作并非他的初衷，虽然在此之前他也翻译过一些中、短篇小说，但那些都是练笔之作。真正要每天翻译新闻稿，对他来说不啻是从零开始。

考取新华社外文部不几天，董乐山就束装北上赴京。火车经南京渡江到浦口，时值深夜，车窗外叫卖茶叶蛋的声音在夜深人静的旅途中听起来备感凄凉。他不由得想起当年家里人送二哥董鼎山赴美国留学时的场景。看着兴冲冲地上汽车去上海杨树浦码头登船的哥哥，他听到母亲在自己的身旁喃喃自语：“这一去以后恐怕没有再见的日子了。”不想一

语成谶，他们的母亲于 1959 年，父亲于 1967 年相继去世，而董鼎山在去国三十余年后才得以回国探亲，不仅没有再见到父母，就连父母的尸骨也因历次政治动乱而荡然无存，无处可寻了。

董乐山到了新华社外文部之后并没有以颇有成就的剧评家和作家自居，而是从普通翻译做起，但他因为英文娴熟、工作出色，很快就独立担纲。当时一般翻译每小时只能翻译三四百字，而他每小时至少可翻译七八百字，最快时可达千字，而且文字质量高，几本翻烂的词典就是最好的证明。这种超常的工作能力大概只有和他共过事的同事才能信服，因为在后来的“反右”政治运动中，他被诬为“狂妄自大，自我吹嘘”，这是他的“右派”罪状之一。

1956 年，新华社成立翻译部，董乐山“官”拜业务秘书，主管日常业务工作。对当官没有兴趣的他却最关心自己的业务水平。他被告知他的业务级别相当于当时大学里的副教授。这一年他三十二岁。在这段期间内，他除了亲自参加重要新闻稿件的翻译和定稿外，还编写了几万字的《新闻翻译手册》，为提携后进，培训刚参加工作的大学毕业生奠定了很好的基础。而且他还为中国外来词汇的汉译标准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现在已经成为汉语中常用的一些词汇，诸如“导弹”、“穆斯林”、“超级市场”、“威慑”、“遏制”等，都是他亲自参与制定的。在斟选《参考消息》的报头题字时，他经过再三考虑选择了鲁迅的手迹，一是因为他从小钦佩鲁迅的风骨为人，二是因为政治运动频仍，他担心其他在世名人的手迹用不长久。他的选择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一直沿用至今。董乐山对新华社乃至翻译界的译风现代汉语化有重要的影响，他的到来使新华社的新闻翻译一改佶屈聱牙、死译硬译的译风。在此期间，董乐山曾与萧乾、徐迟、柳无垢一起为宋庆龄的著作《为新中国奋斗》联合定稿，并参加亚洲、太平洋和平大会和中共八大的翻译处工作，同朱光潜、钱钟书、王佐良、巫宁坤一起定稿。工作之余，董乐山还翻译校订了当时的一些时事政治书籍，如《非洲内幕》、《印度的政治危机》等。

1956 年，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发表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并吁请民主党派帮助共产党整风。作为当时中央认定的全国两百名

高级知识分子之一的董乐山也受到领导指派，组织群众开会提意见。鉴于权力高度集中制约社会的大发展，限制人民的个人创造力，对“引蛇出洞”的“政治阳谋”浑然不知的董乐山提出让干部得到一定程度的择业自由这个在任何正常社会中都是起码常识的意见。1957年夏天，“引蛇出洞”的战略部署完毕，“反右”运动开始。翻手之间，董乐山主张择业自由的意见被称为“干部自由市场论”，从受领导指派组织群众提意见变成了“向党进攻”。董乐山难逃当时大批有识之士的共同命运。他被打成“右派”，送到外地去“劳改”。

### 三

1961年，摘掉“右派”帽子但政治身份仍属于“摘帽右派”的董乐山由河北唐山劳改处调回新华社新成立的外文干部训练班为政治上可靠的出国记者教授初级英文。他不安于这个闲差，除了自己潜心研究语言理论外，还在业余时间替商务印书馆写书评，介绍国外的重要著作，并且参与了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反修灰皮书”的翻译校订工作。

1961年的一天，董乐山在机关图书馆中无意中看到美国记者威廉·夏伊勒（William Shirer）的《第三帝国的兴亡》的英文原著。思想敏锐的他马上意识到这是一本内容翔实、文笔生动的好书，有助于国人全面了解纳粹独裁政权的历史和对人类文明造成危害，遂主动向世界知识出版社推荐出版。该书由董乐山、李慎之、郑德芳等人翻译后于1963年首次内部发行。由于初版印数不多，一时洛阳纸贵，一书难求，在读者中私下流传甚广。该书译风严谨、文笔流畅，除了因为其他几位译者文字水平高之外，还得益于董乐山三次通校全书，字字推敲，其中一次长达一年之久。因为当时还没有恢复稿费制度，他辛勤的劳动换来的只是署名权。此书后又多次再版发行，印数以数十万计，在中国知识界影响很大，对我国翻译文风从欧化到中国化的转变有重要的示范作用。此书还被很多大学英文系和有关机构作为翻译教学的范本，使董乐山在翻译界的地位在社会上得到了认可。

1964年，董乐山因为新华社的外文干部训练班被合并到新成立的北

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而转到该校英文系继续教书。

1966年，世界文明史上最大规模的文化自我摧残“文化大革命”拉开序幕。批斗、抄家、非法关押，董乐山无一幸免。因为他拒绝承认“莫须有”的罪名或诬陷他人，他被关押的时间最长，一直到学校迁到河南明港的“五·七”干校。即使在干校劳动期间，他仍然偷偷教授有心学习的学生英文翻译。1971年，他在搬运重物中由于疲劳过度从拖拉机上摔下将左臂摔断，总算被允许回京接骨治伤。

“文化大革命”后期，董乐山意识到中国的封建孤立状态和“文革”造成的破坏使中国对国外的了解和先进国家的实际状态严重脱节，当时现有的辞书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在明明知道当时没有可能出版的情况下，他开始利用各种途径收集新的英语词汇。这些材料成为他后来主编的《英汉美国社会知识词典》的基础。

#### 四

“文革”结束后，董乐山应出版社之邀翻译了英文初版的《红星照耀中国》。这是这本书在中国流传数十年间最忠实于原著的全译本，是极具历史研究价值和里程碑性质的译作。该书在出版后的两年之内行销一百六十多万册，结束了这本赞扬中国革命、当年激励不少热血青年投向革命的书在革命胜利后却不能公开发行、甚至连图书馆也不能出借的奇怪历史。除此之外，他还和梅绍武、傅惟慈合译了一本理论著作《马克思和世界文学》。

在封笔三十多年后，董乐山再一次涉笔写作小说。1980年他创作的描写在政治运动不断、经济发展停滞的社会条件下知识分子的窘困生活的讽刺小说《傅正业教授的颠倒世界》在《文汇报》发表后获得了该报当年征文小说的一等奖。美国著名文艺刊物《巴黎评论》特意全文翻译刊载了这篇小说和对他的访问记。

1980年，经过国家人事局的干涉和一位人大代表在一次人大小组会上的打抱不平，董乐山总算得以离开并不使他恋栈的北京第二外语学院。经过二十多年的磨难，此时的董乐山除了在职称上一无进展，仍然

是副教授，在居住条件上一成不变，还是全家蜗居一间斗室之外，在思想境界上发生了重大转变，他正在从一个翻译家转变成一个文化评论家和社会批判家。在彻底实现这个转变之前，他在他的职业生涯中还有最后一步要走。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短暂工作一段时间后，董乐山到正在组建的美国研究所，从事美国社会和文化方面的研究。中国此时的美国研究是一片空白，年近花甲的董乐山以惊人的毅力和勤奋再一次从零开始。他以自己常年逐条积累的素材为基础主编出版了《英汉美国社会知识词典》。这是一本新颖的社会语言学性质的词典，收集了一般英美词典或百科全书中不多见的美国社会典故知识，受到语言学界的好评。著名社会语言学家陈原认为该书在我国社会语言学方面具有开拓性的作用。著名教授许国璋也称赞这本词典收入的有关美国社会文化典故知识条目多，有查必得，是报社与研究机关必备之书。此外，他和毕朔望合校了流行一时的《光荣与梦想》，单独校完了《美国志》、《美国新闻史》等书，为光明出版社和社科出版社主编了一套美国丛书，在各类报刊上发表了大量有关美国社会的论文和介绍性的文章，为中国的美国学做了大量的奠基性工作。他以敏锐的洞察力率先在国内撰文介绍并摘译了埃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的《第三次浪潮》，并趁在美讲学之际代表中国未来学会面邀托夫勒访华。他在这个时期出版的几本随笔集《译余废墨》、《边缘人语》、《文化的休闲》和《文化的误读》，表明他的视野不再囿于文学或翻译理论，而是转向有更广阔内涵的有关人性和人类命运的历史、社会和文化问题。而他的一些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如《鬼作家》、《太阳帝国》、《囚鸟》、《冠军早餐》等，则成了他兴趣所至的闲暇之笔。

董乐山晚年投注了最大心血的劳动，是他从以《红星照耀中国》为起点，重点为国人翻译介绍了《一九八四》（获1986年首届“花城译文奖”）、《奥威尔文集》、《中午的黑暗》、《西方人文主义传统》、《苏格拉底的审判》、《古典学》等一系列重要文学和学术著作，对于国人从世界、文化和历史的角度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人文精神，什么是政治极权和政治恐怖，都有重要的帮助。他所做的既不是一时的心血来